

理学读书思想历史演变及其对当前经典阅读推广的启示*

朱原谅 (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

摘要 理学读书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通过对程颐、程颢、朱熹、王应麟、程端礼、陆世仪等人的读书思想进行分析,研究理学读书思想的演变过程;针对当前经典阅读推广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一些解决办法。借鉴理学读书思想的宗旨和《小学》处理五种社会关系的重要意义,认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中,利用《小学》在大学新生中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帮助目前在应试教育下的大学生解决“失小学之序”的缺憾,使之成为一个有道德修养之人,并提出理学思想的阅读推广书目。

关键词 理学读书思想 经典阅读 阅读推广

DOI: 10.13663/j.cnki.lj.2021.10.014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Neo Confucianism Thoughts on Read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on the Promotion of Reading Classics

Zhu Yuanliang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brary)

Abstract Neo Confucianism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thoughts of Er Cheng, Zhu Xi, Wang Yinglin, Cheng Duanli and Lu Shiyi, on readi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volution of Neo Confucianism thoughts on read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reading promotion of classics. Referring to the purpose of Neo Confucianism reading thought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Xiao Xue* in dealing with five kinds of social relations, this paper holds that in the reading promo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Xiao Xue* should be used to carry out reading promotion activities among college freshmen to help college students solve the problem of “lacking the basic education of morality and ethics” under the examination oriented education, so as to make them a people with moral cultiv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puts forward the reading promotion bibliography of Neo Confucianism.

Keywords Neo Confucianism thoughts on reading, Reading classics, Reading promotion

0 引言

理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影响深远。在理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士子们秉承一种读书思想,这种读书思想为理学所独有,可称为理学读书思想,它以经典为核心内容对士子进行阅读训练,并且以体系化方式规定了士子为学的读书内容和读书次序。近千年来,秉承这种读书思想,大量的理学人才喷涌而出,如程颐、程颢、朱熹、辅广、真德秀、许衡、薛瑄、张履祥、陆陇其、陆世仪、张伯行等。当前,经典逐渐成为阅读推广的核

心内容^[1],阅读推广研究者为寻求经典阅读推广的实效,开始尝试从传统文化的读书思想中寻找有效的方法。理学读书思想因其强大的影响力,逐渐受到了阅读推广研究者的重视。目前学者对于理学读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朱子读书法等单个理学人物的读书思想,如徐雁

*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朱熹读书思想整理及其在高校经典阅读推广中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20SJA1429)、常熟理工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项目“经典阅读”(项目编号:JXKC2019019)的研究成果之一。

的《朱熹读书论的“现在时分析”》探讨了朱熹读书论的四大终极关怀，引导读者追求“做德才兼备之人”^[2]，《从苏轼到朱熹：“选精读熟”观的方法论探析》论及朱子读书法六条目录^[3]；存少辉的《谈“朱子读书法”对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借鉴》^[4]、郝如新的《朱子读书法及其启示》^[5]等论述了朱子读书法对语文阅读教学的重要意义；王余光主编的《中国阅读通史》^[6]、蒋永福的论文《论古代中国人的治学智慧》^[7]等也论及了朱熹、张履祥、陆世仪等理学名人的读书治学方法。此外，对于王应麟、程端礼、方孝孺、薛瑄等理学大儒的读书方法单个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如《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及其读书思想刍议》^[8]、《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9]等。对于理学读书思想在形成之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演变，还未见相关的研究。本文试图对理学读书思想的演变过程进行探索，并通过理学读书思想的解读，以期对当前经典阅读推广带来一些启示。

1 理学读书思想的历史演变

两宋时期，理学在与佛学、老庄之学等诸多学说的较量中逐步取得优势地位。理学中体系化的读书思想，成为文人士子为学入德的绝佳门径。理学儒者阅读的核心内容是四书五经，其阅读次序从前往后依次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礼》《诗》《书》《春秋》《易》各类史书及其他书籍，其阅读方法是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10]。理学读书思想的建立，发端于程颐、程颢（以下简称“二程”），成于朱熹，后经黄士毅、辅广、王应麟、程端礼等人的继承、更新和传播，最终由陆世仪集大成，影响后代诸儒。

1.1 从二程《论》《孟》到朱熹《四书》读书内容和次序的转变

理学读书思想起源于北宋二程。二程的读书方法是以《论》《孟》为本，其先后次序为先读《论》《孟》，更读一经，然后看《春秋》。“学者先须读《论》《孟》。穷得《论》《孟》，自有个要约处，以此观他经，甚省力。《论》《孟》如丈尺权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见得

长短轻重。某尝语学者，必先看《论语》《孟子》。”^{[11]255}在此，程子的读书方法，简单而有效，它改变了汉儒读五经的思想，将《论语》《孟子》的地位突出，并认为，只有先读好《论语》《孟子》，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他经书。换句话说，五经是叙事的，而《论》《孟》是讲道的，只有理解了道义，才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因此，程子通过阅读的先后次序，强调读书以明理为先。朱熹在接受二程读书思想后，发现二程思想中更具闪光的部分。程颐有言：“大学，孔子之遗言也，学者由是而学则不迷于入德之门也。”^[12]程颐只是说大学乃初学者入德之门，而非读书为学之门。朱熹认为，读书是以圣人为志，既然《大学》是初入德门之书，自然要成为最先读的书。朱熹将程颐此语置于《大学章句》之首，并称：“于今可见古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12]在此逻辑的引导下，朱熹给门生授课时，定下了读书的基调。“学问须以《大学》为先，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13]186}此条为《朱子语类》中朱熹弟子廖德明的记录，而在门下弟子徐宇、廖谦等人的记录里，不乏同样的语言记载在《朱子语类》中，足以证明，朱熹的读书思想脱胎于二程，但又在二程的基础上有所发明。朱熹将《大学》地位提升到《论》《孟》之前，并且指出《大学》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儒者为学的最高目标。朱熹不仅拔高了理学读书思想的道德高度，并且依据《大学》的“三纲八目”建立了牢固的理学思想体系。在此体系的支撑下，理学读书思想逐渐在朱熹的讲学过程中慢慢成熟，朱熹弟子黄士毅、辅广先后将朱熹关于读书的言论辑录成朱子读书法。黄士毅将朱子读书法辑录在其编撰的《朱子语类》第十一、第十二卷两卷中；辅广将朱子读书法专门单独辑录，形成单行本《朱子读书法》，并分成纲领和读书六法。前者又由黎靖德增删，辑录于他编撰成的《朱子语类》；后者经张洪、齐熙增辑成目前的定本《朱子读书法》，两者都由《四库全书》收录^[14]。钱穆先生对朱子读书法有很高的评价，有言道：“初视若大愚大拙，而实启大巧大智之键。若至钝至缓，

而实蕴至捷至利之机。”^{[15][169]}朱子读书法作为理学读书思想的支撑,影响我国学子读书习惯七百余年。自朱子以后的诸大儒,无一不受益于此读书方法。朱子读书法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最具影响力的读书方法^[16]。

1.2 从王应麟、程端礼到集大成的陆世仪

南宋末年,真德秀、魏了翁等人将理学发扬光大,他们坚守着朱子读书理念,尤其以真德秀最为突出,他撰写的《大学衍义》一书,几乎将之前所有的儒家经典思想都纳入三纲八目中进行阐述,以完成朱熹认为的“《大学》是一个空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实着。如他说格物,自家事去格物后,填教实着;如他说诚意,自家须是去诚意后,亦填教实着”^{[13][187]}。明代湛若水著《圣学格物通》,直接将“为学定在“八目”中最基础的格物一目上,并认为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六目必须都通过格物才得以实现,学术研究越做越精致。真德秀、湛若水等人并未根据实际情况对朱熹读书思想进行改造,只是彻底地执行了朱子读书法。后世对朱子读书法变革着重在训蒙的阅读内容上。朱子读书法主要针对成人,偶有涉及训蒙。朱熹对训蒙的理念和成年人人无二致,强调义理道德教育。“教小儿,只说个义理大概,只眼前事,或以洒扫应对之类作段子亦可。”^{[13][95]}辅广辑录朱子语:“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书,那个是做人底样子。”^{[13][96]}朱熹训蒙是教人如何成人,而不是为学。虽然如此,朱熹还是编撰了《训蒙绝句》《童蒙须知》及《小学》,以加强训蒙中的阅读教育。朱熹之后,王应麟、程端礼和陆世仪在朱子读书法上着力最多,尤其在训蒙的阅读内容和读书次序上的继承和革新,将理学读书思想进一步发扬光大。

1.2.1 王应麟《三字经》对理学读书思想的继承

王应麟(1223-1296年)、程端礼(1271-1345年)并未从祀孔庙,但二人在训蒙方面的影响力相当大。王应麟,字伯厚,庆元府鄞县人。他在训蒙方面的影响力要归功于其著作《三字经》,但根源在他的《小学绀珠》。王应麟希望通过《小学绀珠》中的人伦类、性理类、儆戒类的传统孝、忠、慎、敬来“修

身、齐家”,并通过历代类中的三皇五帝至五代十国时期主要君主名,以及历代杰出帝王事迹来“治国”,再通过学习治道类中的官员道德要求和治理理念来达到“平天下”的目的^[17]。因此,《小学绀珠》其实是与真德秀《大学衍义》一样体现《大学》知识体系的著作,不同的是,《小学绀珠》是训蒙读物。《三字经》是在《小学绀珠》、朱熹的《训蒙绝句》、陈淳的《启蒙初诵》基础上形成的。朱熹的《训蒙绝句》大多为七言五言诗,以义理为重,无法朗朗上口。朱熹弟子陈淳根据朱熹思想,综合前人经验,作《启蒙初诵》,以三字为诵。自“天地性”始,至“睿作圣”终,凡228字^[18]。《启蒙初诵》朗朗上口,全是义理教诲。王应麟自宋亡以后不仕,专心教育子孙,结合朱熹、陈淳的训蒙理念,将《小学绀珠》的核心内容,编撰成《三字经》以训蒙。在《三字经》中,一段体现理学读书次序的文字如下:“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经既明,方读子。……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始终。”^{[19][14]}《三字经》在坚持朱子读书法中“循序渐进”阅读次序的基础上稍加变革,加入了孝经一书。朱熹在自己的教学体系中,对孝经并未做要求,他认为只要读通《小学》,孝经可读可不读,并认为《孝经》非圣人所言。《朱子语类》有言:“《孝经》,疑非圣人所言,……都不曾说的切要处着……如《论语》说孝,皆有亲切味,都不如此。”^{[13][1622]}朱熹认为《孝经》比较牵强附会,不如《论语》说孝亲切。但王应麟对《孝经》有深刻的理解,他在《困学纪闻》中注解《孝经》时与朱熹的解释完全不一样,“刘盛不好读书,唯读《孝经》、《论语》,曰‘诵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诵而不行乎?’苏绰戒子威云:‘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愚谓梁元帝之万卷,不如盛、绰之一言。学不知要,犹不学也”^{[20][256]}。显然,王应麟以此证明了《孝经》的重要性,并将《孝经》在读书次序中的地位提升到四书之前。“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王应麟用一个“通”字和一个“熟”

字，明确两本经典的地位。“通”和“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更能体现重要性。关于《孝经》的地位，在后来元代著名人物拜柱的《通制条格》以及《元典章》社会学规则等国家读书方案中，都有体现。虽然《三字经》是理学读书思想中训蒙读物的巅峰之作^[21]，补充了以往理学读书思想在训蒙教育中的不足，但如果不能深刻理解理学的读书方法和王应麟的读书理念，对于《三字经》的传授和教学，就会陷入枯燥的背诵中去。

1.2.2 程端礼对理学读书思想中蒙学内容与实用性的变革

与王应麟同城、稍晚出生的程端礼，是朱子学说的坚定拥护者。程端礼，字敬叔、敬礼，号畏斋，庆元（今鄞县）人。其《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以朱子的读书思想为基本指导思想，综合了“朱子读书法”及前代书院讲习的基本传统和成果，融合了程端礼书院讲学的宗旨和原理、原则等而制定的一个详细的读书教学课程的计划^[8]。程端礼在训蒙方面，并未使用王应麟的《三字经》和朱熹的《童蒙须知》作为主要教材，而是使用朱熹弟子程端蒙的《性理字训》，这可能与家族姓氏渊源有关，但主要原因应来自《性理字训》内容。《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第一条：“八岁未入学之前读《性理字训》，日读字训纲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孙芝老能言，做性理绝句百首，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又以朱子《童子须知》贴壁，于饭后使之记说一段。”^[22]《性理字训》是常识概念，朱熹曾称赞道：“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23]^[2330]《尔雅》本身是小学字训经典，后人将其列为十三经之一。朱熹说《性理字训》是大《尔雅》，可以理解为：朱熹认为《尔雅》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描写，是针对具体事物的，而《性理字训》是对人类社会和道德行为的概念解释。也就是说，《性理字训》相对《尔雅》而言，是从器上升到道的层面，因此是大《尔雅》，是超越《尔雅》的从精神层面对事物做出的解释。与王应麟《三字经》的文采和有趣性相比，《性理字训》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除此之外，程端礼将理学十五岁

读入德之门书《大学》的年龄提前到了八岁，使八岁不再仅仅是义理教诲和洒扫应对等小学教育的年龄门槛，并开启了八岁后的读书次序：《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春秋》经《三传》^[24]。程端礼继承了理学的成人阅读理念，变革了幼学教育，并且通过不断地实践，使《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最终被元代官方认可，“国子监以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25]，将理学读书思想变成了国家行为，后续明清时代，官学和私学大多以此为读书准绳，开展阅读和教育活动。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读书要体现成果，必须作文。程端礼认为，作文是阅读的最终目的。“文以载道”是读书人能够施展自身才能的主要方式。因此，他要求学子根据朱子读书法，读完四书五经之后，开始读史、读韩文，学作文。朱熹的作文法是读熟一部西汉文，然后韩文、曾巩文。程端礼的作文法稍有不同，他认为，作文先读《资治通鉴》，次读韩文，再读楚辞，然后才能学作文。学作文依然以韩文为榜样，有言曰：“学文之法，读韩文法已见前，即知篇法章法句法字法之正体矣。然后看韩文全集，选看欧阳公、曾南丰、王临川三家。”^[22]^[19]实用性的第二方面是科举。程端礼主张在熟读诗书之后，学子应尽量走上仕途，因此他提出了“作科举文字之法”。科举文做法首推西山法，也就是真德秀的作文方法，其法为：熟读经文文字、熟读经义文字、熟读古赋、熟读制诰表章、熟读策论。“专以二三年工，学文之后，才二十三岁或二十四五岁，字词可以应举矣。”^[22]^[23]读书入仕，成为程端礼阅读和教育思想的主要目的，也正是如此，使得《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备受有意于仕途的士子们推崇。

元代过后，有明一代士人大都以理学读书方法走上为学之路，极少数以治《春秋》五经等方式坚持汉唐的读经传统。即使明代中期阳明心学盛极一时，读书先后次序仍无大的变化，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王阳明亦注

重小学,此与朱子同,皆以家庭教育为成人植根基也^{[26]805}。和王阳明同一时代的大儒湛若水,在敬宗理学的基础上,对成人的阅读次序稍作了修改,他在《大科书堂训》中曰:“学者须先看论语,次大学,次中庸,次孟子,乃书之序也。读论语时,如未曾见论语;读大学时,如未曾见大学;中庸孟子亦然,忘其成心之私、去其习熟之旧,乃有向往之路。否则,面前皆墙壁也。况又有迷心于传注之中者,如瓮鸡禠虱,安能有见?”^{[27]189}湛若水没有明确此番表达的缘由,虽然将四书的阅读次序做了微调,但依然以四书为首要阅读内容。而后晚明东林党兴起,顾宪成、高攀龙成为理学复兴的重要力量,始终传承理学读书思想。

1.2.3 陆世仪对理学读书思想中读书年龄、次序、内容的规定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28]24}十五岁成为长期以来士子踏入为学之门的年龄门槛。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一直以来是理学读书思想的年龄阶段,程端礼将为学年龄提至八岁,并通过制度化,使以往各个年龄阶段读书内容的模糊界限逐渐变得清晰。从历史的纵向维度来看,理学读书思想不断发展,使士子读书的年龄和内容次序的规定性一步步朝着标准化的模式前进,最终由清初陆世仪集大成。

陆世仪(1611-1672年),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人,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江南大儒,光绪元年从祀孔庙。陆世仪将理学进行实学化,使其读书的实学思想贯穿终身,并且将读书的年龄提前至五岁。他在《思辨录》中详细阐述了五岁读书的理由:“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此自是正理。然古者人,心质朴,风俗淳厚。孩提至七八岁时,知识尚未开。今则人心风俗远不如古人子弟,至五六岁已多知诱物化矣。又二年而始入小学,即使父教师严已费一番手脚,况父兄之教又未必尽如古法乎。故愚谓今之教子弟入小学者决当自五六岁始。”^{[29]1}陆世仪根据时代的现状和自身的认识,感觉世道衰微,道德水准与古代相差甚远,必须提前进行道德教育。换言之,陆世仪认为人心不古,如果再从八岁开始入学,那么人的物欲已经形成,而后即使父教师严,也

无法扭转其欲望缠身,难以用教化人的方式而使人心地质朴、风俗淳厚。从此处可以看出,他以忧国忧民为己任,决心从根子上使国人得到纯真教育,以改变世风。他一心想通过理学读书思想的变革来实现其抱负,并且认为朱熹的《小学》太过深奥,不适合五岁儿童学习,因此打算自编《节韵幼仪》,“或三字,或五字,节为韵语,务令易晓,名曰节韵幼仪。俾之即读即教如头容直,即教之以端正头项手容恭,即教之以整齐手足,合下便教他知行,并进似于造就人才之法更为容易”^{[29]45}。不过,查遍陆世仪遗著40余种,并未见《节韵幼仪》编撰而成。倒是后学汪志伊完全按照陆世仪的读书思想,编撰了同名的《节韵幼仪》。汪志伊在序中坦言:“为正蒙养……编成《节韵幼仪》一书,或三字、或五字,节为韵语,务令易晓。”^[30]这和陆世仪的想法如出一辙,可以说,陆世仪没有完成的事业,已经由后学接续。不管陆世仪是否编撰了《节韵幼仪》,也不妨碍他的读书思想在理学的基础上不断变革和创新,以至于最终丰满而成就了他的“三个十年读书法”。

陆世仪的《思辨录》“格致类”卷记载:“古之学圣贤易,今之学圣贤难。只如读书一节,书籍之多千倍于古学者。苟欲学为圣贤,非博学不可。然苟欲博学,则此汗牛充栋者,将何如耶?偶思得一读书法,欲将所读之书分为三节:自五岁至十五为一节,十年诵读;自十五岁至二十五为一节,十年讲贯;自二十五至三十五为一节,十年涉猎。使学有渐次,书分缓急,则庶几学者可由此而程功,朝廷亦可因之而试士矣。所当读之书约略开后。”^{[29]45}他用谦虚的文字说明自己“偶思得一读书法”,但很明显他为理学读书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奠定了一个很高的起点——“欲学圣贤”。换句话说,陆世仪解释了读书的目标,读书并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利益、荣誉和出仕,而是为做圣贤,上接孔孟之圣道,下续周程张朱贤哲之路。因此他说:“读书不绝于禄念头,终无得处,亦终无乐处。”^{[29]2}除此之外,他认为学者读书必须先立志。“学者欲学圣人,须是立志第一。志气锐,学问方有成功”^{[29]2}。如果不学圣

贤，又不立志，就会为世俗所惑，即使博学，也无法成为圣贤。因此，在学圣贤、立志为学之后，陆世仪为士人的终身学习开出了“三个十年读书法”阅读书目。书目如下：

十年诵读：小学、四书、五经、周礼、太极通书、西铭、纲目、古文、古诗、各家歌诀。

十年讲贯：四书（宜看大全）、五经（宜看大全）、周礼、性理、纲目、本朝事实、本朝典礼、本朝律令、文献通考、大学衍义、衍义补、天文书、地理书、水利农田书、兵法书、古文、古诗。

十年涉猎：四书、五经、周礼、诸儒语录、二十一史、本朝实录及典礼律令诸书、诸家经济类书、诸家天文、诸家地理、诸家水利、农田书、诸家兵法、诸家古文、诸家诗^{[29]48}。

“三个十年读书法”首先完善了五至十五岁小学阶段的学习任务。陆世仪明确提出，小学阶段的阅读，无他，就是记诵。他说：“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自十五以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人凡有所当读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熟读。不但四书五经，即如天文、地理、史学、算学之类，皆有歌诀，皆须熟读。若年稍长，不惟不肯诵读，且不能诵读矣。今人村塾中开蒙多教子弟念诗句，直是无谓。”^{[29]36}这段文字是他第一个十年读书法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学者如果不自幼多读多背，至年长，记诵就更加困难，就会胸中无言无物，根基不牢，如要成大器，所付出的努力将是常人无法承受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陆世仪在理学读书思想的基础上，企图从幼学开始为国家人才培养一个标准化模式。陆世仪将读书的年龄提至五岁，并且将幼学的背诵和阅读的内容大大增加，为了能够使读书人在十五岁之后更好地理解 and 运用经典内容。换句话说，他不希望人在幼学的年龄过多接触社会，为物欲所染，因此，需要用纯净的有崇高道德的思想注入幼儿的脑海中，用记诵的方式占据幼儿的玩乐时间，从小就塑造一个有坚强意志力和高度道德精神的圣人坯

模。培养圣人坯模的做法本来就深深植根在朱熹的读书思想里，朱熹有言曰：“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但未有圣贤许多知见。及其长也，令入大学，使之格物、致知，长许多知见。”又言：“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工夫。”^{[13]94}陆世仪秉承了朱熹的这些思想，第一个“十年读书法”成为他培养“圣贤坯模”的实践方法。

第一个“十年读书法”是基础，打牢了基础，第二个“十年读书法”才能顺利地开展。在陆世仪看来，只有全面记诵四书、五经、周礼等拥有道德价值观的书籍，才能够拥有理解和判断其他书籍之好坏优劣的标准，并且能够根据自身的能力选择一种专业的知识学习，借以实施他的实学思想，开始为理解天理人欲、理解社会进行训练，从而为未来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行为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在15岁至25岁的第2个10年中，陆世仪特别注重在记诵后加强对经典的理解和运用。

第三个“十年读书法”完全体现了陆世仪经世致用的读书理念。在这个十年里，他强调的是一种“学而时习之”的理念。士子读书，就是要将所掌握的知识，不断通过阅读、思考和实践，在实业中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

从“三个十年读书法”中，可以看出，陆世仪坚守着一个很强的原则：“读书的目标是为圣为贤”。培养“为圣为贤”的基础知识来自四书、五经和周礼。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四书、五经和周礼，是陆世仪在三个阶段坚守的阅读内容，是所有阅读内容的核心和支撑，少却了它，读书人就是没有精神支撑的世俗化的普通人。换句话说，陆世仪为终身阅读提供了一种永久的反复阅读的模式，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经典常读常新”的理念，而其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和周礼。这是陆世仪除了在幼学上的变革外，提出的终身阅读理念。在他的理念中，任何人在修齐治平的修炼过程中，都离不开四书、五经和周礼的指导和支撑。

陆世仪还专门论述了如何阅读四书与五经。他认为,四书是终身阅读的核心,须时刻玩味,不得放弃。对于五经,“惟《易》具天人之理,完完全全无少欠缺,为不可拟,亦不必拟。其若《书》与《春秋》即后世之史也。《春秋》专记事实,《书》则兼载文章,亦即后世古文之类。《诗》即后世之诗也。《礼》则纪三代之典礼,后世帝王代起,有一代则有一代之制作,礼未常无也。故愚以为五经之中,惟《易》在所不必续,其如诗、书、礼、春秋,皆在所必续”^{[29]45}。可见,五经中,《周易》在他心中的地位是最高的,其他经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解读变得越来越宽,需要不断补充,也需要回归原经原典,结合现实情况,才能继续传承和深刻领悟,唯有《周易》亘古不变,如同天理不变一个模样。

在实用方面,由于陆世仪本人不重科举,注重人格完善教育,因此,他认为读书最主要的是修身进德,作文是道德传承的主要手段。他最看不起那些没有道德又非常会作文的人,“见道之资与世俗聪明之资煞是不同,每见有等极会读书、极会作文者,语之以道则茫然不晓,而市井负贩反有点头会意者,则知入道别有根气,非世俗聪明之人所能仿佛也”^{[29]1}。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坚守了“文以载道”的理念,认为作文必然是自身道德的本源流出,而不是以花言巧语诱惑众人。读书人如果不能做到“文以载道”,即使会作文,也比不上市井负贩之人。读书人要以“格物致知”的方式,在培养道德的基础上,多学习各种知识,以此达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目标。

陆世仪的“三个十年读书法”,将理学的读书思想上升到为圣为贤的终身阅读理念,并形成了标准化模式,从而使理学读书思想达到巅峰,趋向圆满。张伯行得《思辨录》,爱不释手,重新刊行,将其纳入苏州紫阳书院教材之中,并誉之曰:“或陆子为朱子后一人……正学之干城也。”^{[29]1}周永年在《先正读书诀》中大量记载陆世仪读书法^{[31]35},陈沆对陆世仪的读书方法也大加赞扬^{[32]74},陈弘谋的《五种遗规》将陆世仪读书法置于《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之前^{[33]42},足见其重要程度。“五岁读

经”“三个十年读书法”的理念自陆世仪始,对后世影响深远。

2 理学读书思想对经典阅读推广的启示

理学思想认为社会关系可浓缩成父子、夫妇、上下级、长幼、朋友等五种关系,读书人通过不断理解和处理这五种关系而成长、成熟。《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为国人交,止于信。”^{[12]6}仁敬孝慈信,是理学读书人处理社会关系的至善境界。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旨第一条为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34]114}。这说明了为学读书的根本在于如何认识并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因此,理学读书思想包含的阅读内容,是以“五教之目”为宗旨的。从二程的书目到朱子的书目,再到程端礼的书目,最后延伸到陆世仪的书目,都是为处理这五种关系而形成的阅读书目。

朱熹编撰的《小学》是理解五种社会关系的核心书籍,在人的成长和为学两方面有重要作用。《小学》内容包含了内篇三大纲目立教、明伦、敬身,加上稽古一篇,共四篇;另有嘉言、善行两外篇。《小学》六篇囊括了古代圣贤关于修身立人的言论,是后学进德的最高指导和最佳经验。古代圣贤对《小学》一书十分推崇。朱熹曰:“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书,那个是做人的样子。”并在《小学》题辞中曰:“嗟嗟小子!敬受此书,匪我言毫,惟圣之谟。”^{[35]2}他用了一个“敬”字,无论在他引以为豪的《四书章句集注》,还是其他编撰的书籍中,都未曾在前言或者推荐语中使用过如此严肃的字眼,可见其对《小学》寄予了极大的希望。许衡曰:“《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讲习,望于此有得,他书虽不治,无憾也。”薛瑄曰:“仁义礼智信五字,括尽《小学》一书。……他书不读无憾也。”吕大临曰:“自学者言之,不至于《大学》所止则不进;自成德者言之,不尽乎《小学》之事则不成。”熊赐履曰:“看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佛经,不如读一章小学”^{[35]3},

由此足以证明,《小学》一书对为学入门的重要意义。在朱熹眼里,《小学》不但可以从小培养成圣成贤的圣人坯模,还可以使没有从小建立良好道德的成人获得好的行为习惯。《朱子语类》记载:“某自幼既失小学之序矣,请授大学,何如?朱子曰:授大学也须先看小学,只消旬月工夫。”^{[13]2166} 目前,学子们在高中毕业以前,潜心于为考试而进行的知识学习中,是家庭的掌上明珠、社会保护的核心,几乎丧失了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能力,成为朱子所言“失小学之序”之人。根据朱熹的理解,有志为学者不管年龄多大,都需要通过阅读《小学》建立圣贤道德观念,以此进入为学之门。高校如果通过理学进行传统文化通识教育,可尝试在新生中开设诵读《小学》的课程或者策划相关的阅读推广活动,用一个学期的时间,也就是朱子所说的数月时间,使“失小学之序”的学子,建立良好的道德品行和生活习惯。

古代为圣为贤三不朽是立德、立言、立功,四子六经之书,饱含三者之精髓。朱子有言:“《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四子,六经之阶梯。”^{[13]1992} 张伯行在《学规类编》里著言:“经书为义理之渊源,读史有真性,作文乃雕虫小技。”又言:“诗书濯其灵府,史籍长其精神,文章抒其见识,是为学者无穷之乐也。”^{[36]244} 理学读书思想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为圣为贤的追求目标和构筑幸福生活的人生理想。理学读书思想的核心书目,除了《小学》、四书五经、史学著作等儒学经典书籍外,还有一些体现理学思想的经典著作,如朱熹、吕祖谦编撰《近思录》、薛瑄的《读书录》、王守仁的《传习录》、陆世仪的《思辨录》等,都是理学家们在自身刻苦读书后结下的硕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深入阅读。理学读书思想包含的阅读书目、阅读次

序和阅读方法,以及它以处理社会关系为读书的宗旨,对于解决目前中华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中阅读内容的选择和阅读方法的培养等问题,有较好的参考价值。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的阅读推广人,可以根据各种阅读推广方式,以培育读者良好的道德品质为目标,有目的地选取理学经典书目,按照阅读的先后次序,利用理学读书方法,尝试对这些书籍开展相关的阅读推广活动,并在推广活动中注入各种技能的训练,如阅读、抄写、朗诵、书法、舞台剧表演、写作等,以增强读者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提高经典阅读推广活动的有效性,进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

3 结论

综上所述,理学读书思想历史演变主要体现在为学年龄门槛的幼龄化、训蒙读物的合理化、阅读内容的扩展化等方面。在“为圣为贤”的目标指引下,为学年龄从十五岁读《大学》,提前至八岁,最后定格在五岁;训蒙读物的变化体现在从朱子的“说个义理大概……洒扫应对做段子”的随意性,变成《性理字训》《童蒙须知》,最后直接到《小学》;阅读内容规定性的扩展主要从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成人阅读,扩展到训蒙读物,再扩展到各种实学经典的终身阅读。理学读书思想对于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启示在于:一是可尝试通过《小学》的阅读、理解和实践,帮助目前在应试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解决“失小学之序”的缺憾,使之成为一个有道德修养之人;二是将理学阅读书目列为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书目选择的依据,可缓解阅读推广内容选择的盲目性问题。因此,借鉴理学读书思想开展经典阅读推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目前阅读推广存在的问题,也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起到良好的作用,进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 [1] 朱原谅. 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发展特点与关键发展问题探析——对“第三届大学生阅读推广峰会”的评述与思考[J]. 图书馆杂志, 2019, 38(3): 33-38.
- [2] 徐雁. 朱熹读书论的“现在时分析”[J]. 大学图

书情报学刊, 2010, 28(5): 82-85.

- [3] 徐雁. 从苏轼到朱熹:“选精读熟”观的方法论探析[J]. 图书馆杂志, 2019, 38(4): 4-11.
- [4] 存少辉. 谈“朱子读书法”对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借鉴[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7, 268(20): 57-58.

- [5] 郝如新. 朱子读书法及其启示[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05.
- [6] 王余光. 中国阅读通史[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7.
- [7] 蒋永福. 论古代中国人的治学智慧(下)[J]. 图书馆, 2019(10): 22-27; 46.
- [8] 任蒙.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及其读书思想刍议[J].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9(4): 118-123.
- [9] 张健旺. 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D]. 北京: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
- [10] 朱熹. 朱子读书法[M]. 李孝国, 董立平, 译注. 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 [11] 程颢, 程颐. 二程遗书[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12]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13] 朱熹; 黎靖德. 朱子语类 第1册[M]. 武汉: 崇文书局, 2018.
- [14] 朱原谅. 朱熹读书法版本辨析及其对阅读推广的启示[J]. 图书馆杂志, 2020, 39(4): 50-56; 61.
- [15] 钱穆. 朱子学提纲[M]. 3版.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16] 康宇. 朱熹“读书法”中的阐释学意蕴[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0-03-17(002).
- [17] 韩杰会. 《小学紺珠》与王应麟童蒙教育思想研究[D]. 兰州: 西北民族大学, 2017.
- [18] 高令印, 陈其芳. 朱熹高徒——陈淳的哲学思想[J].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1985(3): 18-21; 17.
- [19] 王应麟. 三字经[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 [20] 王应麟. 困学纪闻[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21] 刘晓东, 张丽. 国学启蒙经典中的“阅读推广”——《三字经》蕴含的阅读方法与指导思想探析[J]. 图书馆建设, 2020(2): 83-88.
- [22] 程端礼.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附纲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23] 朱熹. 朱子全书第22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24] 罗玉梅. 程端礼及其《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研究[D].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09.
- [25] 宁俊伟.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与元代的教育思想[J]. 高校理论战线, 2007(6): 46-49.
- [26] 钱穆. 国史大纲 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 [27] 湛若水. 湛甘泉先生文集 1[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28] 钱穆. 论语新解[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 [29] 陆世仪. 陆桴亭思辨录辑要 1[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30] 汪莹. 汪志伊及其著作考论[D]. 合肥: 安徽大学, 2019.
- [31] 周永年. 先正读书诀[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32] 严佐之, 戴扬本, 刘永翔. 近思录专辑 第11册[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 [33] 陈宏谋. 五种遗规[M]. 北京: 线装书局, 2015.
- [34] 邓洪波. 中国书院学规[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
- [35] 张伯行. 小学集解[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民国26年.
- [36] 张伯行. 学规类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民国25年.

朱原谅 常熟理工学院图书馆阅读推广部主任, 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 经典阅读。E-mail: 7397607@qq.com 江苏常熟 215500

(收稿日期: 2020-11-10 修回日期: 2021-03-12)